

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的传播与理论扬弃

赵广军

【提要】 20 世纪 30 年代是近代中国大量译介国外各种唯物史观理论书籍的时期,一本多译的情况比较普遍。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便是其中中译本较多的著作。民国时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多种译本的广泛流行,对传播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时人注意到布哈林的理论中存在机械性等问题,故在将其作为知识资源时,逐渐扬弃之。深入考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的译介、传播和理论扬弃,可以一窥民国时期国外同类理论著述影响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的复杂面相。研究唯物史观在近代中国的构建,不仅应梳理理论内在的演变逻辑,也须梳理其文本传播的演进脉络。在此基础上,对唯物史观理论中国化的具体历程,则会有更深入的认识。

【关键词】 布哈林 历史唯物主义 近代中国 译介

20 世纪 30 年代是唯物史观理论激烈争论的时代,随着国外唯物史观理论书籍的大量译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借此传播,呈现出一个理论成长和扬弃的过程。在当时各种唯物史观理论译介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一直在场,被视为新兴的理论资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中,布哈林及其理论在近代中国具有一定的影响。以布哈林作品为个案来观察唯物论所呈现出的扬弃过程,是与唯物论构建的总体情况相一致的。1932 年以前,在布哈林作品的中译本中,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手册》(以下简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最为著名,有一本多译的情况。在整个近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理论构建中,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中译本数量较多、传播较广,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构建起到很大的基础理论宣传作用。该书虽被认为有机械性等问题,但在当时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被时人视为学习、研究哲学的入门书或必读书。

目前学界对布哈林的研究已走出以批判为主的境况,特别是苏联解体前的 1988 年,布哈林不仅获得政治平反,而且得到“学术平反”,其理论也受到重新关注和研究。近年来,借助《布哈林文集》的出版,“再认识布哈林”“重读布哈林”“重评布哈林”竟成热门领域。^①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布哈

^① 学术史整理有许国林《20 年来布哈林问题研究述要》,《洛阳大学学报》2000 年第 3 期;闫素娥《关于对布哈林的评价》,《历史教学》1997 年第 6 期;夏凤《布哈林研究在中国》,《人民日报》1988 年 10 月 14 日,等等。主要研究有苏绍智、郑异凡、张伟垣、许林森等人的相关著述。布哈林的传记多达十几种:科恩《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政治传记 1888—1938》,徐葵等译,人民出版社 1982、1983、1988、2005 年版;罗伊·麦德维杰夫《布哈林的最后岁月》,段稚荃、张敦厚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8 年版;B. B. 茹拉甫列夫《布哈林——人、政治家、学者》,东方出版社 1992 年版。另外还有范玉传、闻一、叶书宗、赵邗方等人所作的布哈林中文传记。这些研究都尝试重读、重评布哈林,且多持肯定立场。

林思想和理论贡献,如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哲学平衡论、有机体理论、机械论等,对布哈林著述在近代中国的传播缺乏历史角度的研究。因此,从民国时期布哈林作品译介的个案入手,通过文本翻译、社会传播到理论批判所呈现出来的历史细部,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中国化问题颇有意义。

一、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中译本

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民国时期到底有多少译本,记载颇存分歧,^①以致梳理不清。从实物和相关文献记载来看,民国时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至少有八九个译本,如下表:

20 世纪 30 年代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译本情况一览表

译者	译名	出版者	出版及版本情况
许楚生	《唯物史观与社会学》	北新书局	许楚生即许德珩。时称“译笔很流利,是各本中最先出的一种”。 ^② 1930 年初版,1932 年、1943 年分别再版。 ^③
陶伯	《唯物史观》	泰东图书局	陶伯即彭述之。时称“译笔严谨,用语很用了一番心机斟酌”。 ^④ 1930 年出版,全书 880 页。书名原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伊凡、梅根合译 ^⑤	《历史的唯物论》	南强书局	两人的合译本分别在南强书局和平凡书局出版,“姓名都是假的”“这个译本是俄国中山大学的教本,是谁译的谁都不知道”“这部译文非常的精审”,卖得很便宜。 ^⑥ 该译本是从俄文原本直接翻译的。 ^⑦
伊凡、梅根合译	《唯物史观大纲》	平凡书局	普及版有两个版本,实际上是一个译本。1930 年的平凡书局以“出版社会科学书闻名”。平凡书局的《唯物史观大纲》甚为流行“全书六百页,普及版仅售一元,可为开中国出版界之新纪元。因为这本书本身既有价值,售价又特别低廉,所以销路甚广云。” ^⑧

① 大体可分为三类:1. 有说 5 个版本,但又列有乐群书店《史的唯物论》、东亚书局《唯物史观社会学》2 个“新版本”,共 7 个版本(参见张伟垣、许林森《被玷污的岁月——布哈林与布哈林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86 页);2. 有记为许楚生、伊凡和梅根、陶伯、刘伯英 4 个译本(参见周隆宾主编《社会历史观大辞典》,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91—92 页);3. 有称 5 个版本的(参见尼·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李光谟等译,东方出版社 1988 年版,“译者的话”,第 1 页)。这些统计均不完全。

② 锡《布哈林唯物史观的七种译本》,《读书杂志》第 1 卷特刊号,1931 年 4 月。

③ 《唯物史观社会学》,北新书局、东亚书局 1943 年版。译者序虽没有标明 1932 年译者序的时间,但版式等内容仍是 1932 年版。

④ 锡《布哈林唯物史观的七种译本》,《读书杂志》第 1 卷特刊号,1931 年 4 月。

⑤ 有学者指出,译者是平凡书局创办人高尔松、高尔柏兄弟。参见陈江《平凡书局主人的不平凡生涯——高尔松传略》,《出版史料》1992 年第 1 期。在平凡书局推介该书的广告中称“译者梅根、依凡两先生,留学俄国有年,对于唯物史观,最有研究。”而高尔松早年留学的是日本,不是俄国。待考。

⑥ 锡《布哈林唯物史观的七种译本》,《读书杂志》第 1 卷特刊号,1931 年 4 月。

⑦ 《出版新书〈历史的唯物论〉》,《中学生》第 8 号,1930 年 9 月。

⑧ 《平凡书局出版消息》,《读书月刊》第 1 卷第 1 期,1930 年 11 月。

续表

译者	译名	出版者	出版及版本情况
伊凡、梅根合译	《历史的唯物论》	南强书局	与平凡书局普及版译本的“内容是一样的”,实际上是一个译本。 ^①
梅根等译	《历史的唯物论》	普益出版社	1930年6月初版。与南强、平凡书局印本为同一个版本。书前有校者序及原序。
伊凡、梅根合译	《唯物史观大纲》	社会经济学社	1930年7月初版,1930年8月、1936年分别再版,共608页。
刘伯英	《历史的唯物论》	现代书局	1930年8月初版, ^② 全书453页,分章结构与陶伯所译一样,但篇幅明显要少。
郭仕裁	《史的唯物论 (社会学的体系)》	乐群书店	1931年1月初版。全书443页,印2000册。 ^③
李铁声	《辩证法的唯物论》	江南书店	在诸多民国时期书目中,均不见记载此书。 ^④ 1929年出版,与现代书局1930年出版的《历史的唯物论》为同一书。 ^⑤
郭冠杰	不详	不详	在北平付印,截至1931年4月,上海读者并未见到。 ^⑥
不详	不详	商务印书馆	史料记载称“在革命军北伐的时期有一个译本付印,后来因为时局的转变没有发行。” ^⑦
不详	《唯物史观社会学》	东亚书局	1932年出版, ^⑧ 待考。

在这九个译本中,陶伯译本专业性较强,体量最丰,传播也广。1930年,人们对该书一本多译的文化现象称“本书的中文译本,除北新版外,尚有平凡版,泰东版,现代版等三四种。于此,更足见本书的价值,中国读者之需要此书了。”^⑨面对多种译本,读者一时间无从选择,“布哈林底‘唯物史观’有五种译本,泰东的,北新的,现代的,南强的,和平凡的……究竟哪一本是较完善的译本呢?”^⑩于是,有读者求助《书报评论》杂志询问“以那一种为佳”。该杂志甚至请人将诸译本与原文(或德文本)对校,以评定哪一个译本较好。^⑪1934年,时人在整理社会科学出版物时列出所认可的该书的中译本,称“中译本有几种,一为北新出版的《唯物史观与社会学》,一为泰东出版的《唯物史观》,一为现代出版的《历史唯物论》。”^⑫这里显示出作者认可的三种版本:许译、陶译和伊译。

- ① 《唯物史观有五种译本》,《读书月刊》第1卷第1期,1930年11月。
 ② 《新书目录》,《读书月刊》第1卷第1期,1930年11月。
 ③ 张伟垣、许林森《被玷污的岁月——布哈林与布哈林问题》,第386页。
 ④ 金水《哲学译书目》,《书报评论》第5期,1931年5月。
 ⑤ 张伟垣、许林森《被玷污的岁月——布哈林与布哈林问题》,第386页。
 ⑥ 锡《布哈林唯物史观的七种译本》,《读书杂志》第1卷特刊号,1931年4月。
 ⑦ 锡《布哈林唯物史观的七种译本》,《读书杂志》第1卷特刊号,1931年4月。
 ⑧ 张伟垣、许林森《被玷污的岁月——布哈林与布哈林问题》,第386页。
 ⑨ 子真《书评〈唯物史观与社会学〉》,《北新》第4卷第17期,1930年10月。
 ⑩ 编者《从择书的困难——谈到本刊底任务》,《书报评论》第1期,1931年1月。
 ⑪ 编者《关于〈史的唯物论〉中译本》,《书报评论》第4期,1931年4月。
 ⑫ 陈端志编《现代社会科学讲话》,生活书店1934年版,第398—399页。

从文本的实际内容来看,这三个译本的确精良一些,但时评不同。例如,伊凡、梅根译本由五个出版机构出版,因而被讽刺一稿两卖,以《水浒传》中解珍、解宝的绰号称之为“两头蛇的梅根和双尾蝎的依凡”:南强的是《历史的唯物论》,平凡的是《唯物史观大纲》,两书的译者都是二人,内容几乎一字不差。^①

翻译者的学科出身能够体现翻译时关注的问题。就译者学科出身而言,许楚生以社会科学的立场和知识背景从事翻译,他“初宗杜尔干(Emile Durkheim)学派之说”,在1930年国内“马克思主义派”成为“普遍思潮”的情况下,成为“接受此派思想的社会学家”。^②许楚生在翻译该书时,将书名简译为《唯物史观与社会学》。^③这一处理凸显了唯物史观与社会学的关联,表明译者原有的社会学基础。事实上,对于书名的翻译,译者们比较谨慎,往往根据中文习惯稍加调整,以求该书在中国有更为广泛的传播。从上述列表中各中译本书名来看,译者们都没有按照原书正副标题的形式翻译,而是根据所理解的书意、中文习惯重新拟就书名,这说明译者对该书关注点的不同。

译者陶伯“专究社会学和哲学”,^④时人称“陶伯是新青年中彭君的笔名”。^⑤《现代中国作家笔名录》显示,彭述之曾用化名“陶伯”“张次南”,^⑥甚至有称“陶伯=彭述之”。^⑦彭述之是中共党内早期的理论家,1921年春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4年回国。1927年后寓沪,无生活来源,又“绝不能到社会上去找职业”,^⑧只好“化名靠译书维持生活”。^⑨彭述之以“陶伯”为名,在泰东图书局出版过两本译书,其一就是布哈林的《唯物史观》。^⑩在译者序中,陶伯因非常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文献,相对精准地言说了历史唯物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并强调要注意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论的“正确运用”,即“如何运用此种方法去研究历史,去分析社会现象,去观察事变”。^⑪因此,在译本的可靠性上,陶译本更为精准。

译本所依靠的原本可以揭示出译本知识来源的直接性和间接性。1935年《生活全国总书目》提到该书四个译本源的基本情况:陶伯译《唯物史观》“据俄文”,许楚生《唯物史观与社会学》“据法文”,刘伯英《历史的唯物论》“据英文”,伊凡等译《唯物史观大纲》“据日文”。^⑫但在具体的翻译中,有译者直接根据原本翻译,如梅根、依凡合译的《历史的唯物论》从俄文原本直接翻译出来,“译笔的晓畅流利,忠实信达,尤能保持原著的价值,直无异于原著的影照”。^⑬有译者以原本为基础,辅以其他译本,如陶伯依本是莫斯科国家出版部印行的俄文第二版,在翻译中参考了美国国际出版社的英

① 陈超今《两头蛇的梅根和双尾蝎的依凡》,《中国新书月报》第1卷第2号,1931年1月。

② 杨堃《中国近三十年来之出版界(社会学之部)》,《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二之七),1943年7月。

③ 布哈林《唯物史观与社会学》,许楚生译,社会问题研究社1930年版,“译者序”,第1页。

④ 柯诺《马克思家族发展过程》,朱应祺、朱应会合译,泰东图书局1930年版,书尾有《唯物史观》一书的广告。

⑤ 锡《布哈林唯物史观的七种译本》,《读书杂志》第1卷特刊号,1931年4月。

⑥ 袁涌进编《现代中国作家笔名录》,北平中华图书馆协会1936年版,第68页。彭述之化名张次南是大家熟悉的,但化名陶伯却不为人所提及。

⑦ 陈德芸编著《古今人物别名索引》,岭南大学1937年版,第538页。

⑧ 陈碧兰《早期中共与托派:我的革命生涯回忆》,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317页。

⑨ 陈碧兰《回顾我和彭述之的岁月》,《彭述之选集》第1卷,十月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

⑩ 陈碧兰《早期中共与托派:我的革命生涯回忆》,第318页。

⑪ 布哈林《唯物史观》上册,陶伯译,泰东图书局1930年版,“译者序言”,第2、3页。

⑫ 平心编《生活全国总书目(1935年)》,生活书店1935年版,第42页。

⑬ 《出版新书〈历史的唯物论〉》,《中学生》第8号,1930年9月。

文译本(根据第三版翻译的)、广岛定吉与榑崎辉的两种日译本(根据德文译本转译的)。^①还有译者通过其他语种的译本进行转译,如许楚生因不懂俄文,^②遂“根据依原本第四版之法文译本,参考依原本第三版之美国国际出版社的英文译本,与佐野学等和富士辰马等的两种日文译而翻译的”。^③许楚生之所以选择法文译本,是因为他曾留学法国巴黎大学,熟悉法文。许楚生的中译本自发行后,多次再版,传播广泛,直到1947年还有人在阅读,该书被认为是宣传“共产主义的”。^④从两人译本、参考译本的情况可以看出,布哈林该书在俄文、英文、法文、日文中的多译本现象与中文类似。从最终的译本来看,许译和陶译在体量上有较大的差距:陶译三册共800余页,许译不足600页。这可能是由于原本的体量差异造成的。

事实上,从当时的书评和读书界的反应来看,几个译本各有所长,其中许楚生译本因被视作“名著”,内容“很有价值”,值得“精读”,而频频被推荐阅读。^⑤1930年,面对颇多的社会学译作,时人向青年介绍“应该注意”的书籍时,就提到“许楚生译的《唯物史观与社会学》”。^⑥1934年,有人在报章上询问什么书值得推荐阅读,便包括“许楚生译的《唯物史观大纲》”。^⑦由于布哈林该书的译本众多,因此,布哈林唯物观也逐渐流行。

二、布哈林的书写风格

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为苏联第一部普及性历史唯物论著作,在中国的出版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需要。1929年,黎东方在翻译《历史唯物论》时就考虑到理论的阙如,“想给今日政治家一个刺激”。^⑧1930年,时人称“现在全世界上关于‘唯物史观’的佳著极少”,因此,布哈林的《唯物史观》“能风行一时”。^⑨1938年,时人仍称,“关于史的物本论这一科目的入门书,中国出版界是非常贫弱的。”^⑩科学的唯物论书籍或读物太少,这是20世纪30年代布哈林作品出现多译本的一个现实原因。在出版界看来,“年来吾国出版界之介绍各国名著,都有长足的进步,很显然的这是表示了中国出版界的空虚与读者对于较深的学术的理论的要求之迫切;而这部《历史的唯物论》便是应以上同样的要求而介绍过来的。”^⑪与此同时,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也引发理论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需求,需要以正确的理论来认识当下的中国社会性质。在中国共产党等“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情况

① 布哈林《唯物史观》,陶伯译,“译者序言”第8页。

② 布哈林《唯物史观与社会学》,“译者序”第4页。

③ Boukharine《唯物史观社会学》,许楚生译,北新书局1932年版,“译者序”第1页。

④ 王季同《读〈唯物史观与社会学〉》,《弘化月刊》第74、75期,1947年8月。

⑤ 柯柏年编《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新文艺书店1932年版,第69页;陈端志编《现代社会科学讲话》,生活书店1934年版,第408—409页。

⑥ 章衣萍《作文讲话》,北新书局1930年版,第231页。

⑦ 《垣民之友》第1卷第12期,1934年12月。

⑧ 施亨利《历史唯物论》,黎东方译,民智书局1929年版,“译者弁言”第1页。

⑨ 吴理屏编译《辩证法唯物论与唯物史观》,心弦书社1930年版,“编者序”第1页。

⑩ 平心编《各科基本知识讲话》,上海杂志公司1938年版,第95页。

⑪ 《出版新书〈历史的唯物论〉》,《中学生》第8号,1930年9月。

下,^①缺少有理论深度的分析手段来解决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规律等理论问题,以及革命的实际问题——当时的论战需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而历史唯物主义也逐渐被视为更加科学或者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②

最早被译成中文的布哈林著作是《共产主义 ABC》,之后新青年社又出版布哈林的《农民问题》《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等著作,布哈林是入选新青年社丛书最多的作者。译者们判断布哈林“是俄国革命的要人”,且“具有深远的学问和锐敏的思索力,创出了许多的名著,不论是专门的或是通俗的”。^③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之所以频频被翻译为中文,正是考虑到布哈林“是现代社会科学界一位最有权威的学者,是现代政治上和革命史上的一位伟大的人物”,该书“是他许多名著中的一本精心不朽之作”。该书有两个特点:一是“供给读者以一种较高深的完备的社会科学的知识,理论虽深奥,而文笔却十分流利浅显,使人易于了解”;二是“不但对于马克思的理论之根本的基础有一个有系统的说明,而且对于一切最复杂的问题都能加以精密的讨论”,更是“指示了一般人以正确的道路”。^④

布哈林唯一讨论唯物论的著作《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于 1921 年出版。此时正值布哈林事业的最高峰,他“被广泛地认为是党内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和第一流的权威”,书中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系统阐述。^⑤在理论方面,列宁虽赞誉“布哈林不仅是党内的最有价值的与最伟大的理论家,而且很正当的可以把她算作全党的宠儿”,但也质疑其理论观点的马克思主义性,认为他的理论中“还包含着烦琐哲学的观点”,且“从来未曾完全按着辩证律去了解”。^⑥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就是在未完全理解辩证法的情况下写就,并译介到中国来的。

就写作属性来看,布哈林的这本书具有通俗化和普及性特点,这也使得它在中文世界唯物史佳作阙如的背景下更具吸引力。虽然布哈林撰写该书是为了给“非专业知识分子广大读者”提供一种“常识哲学”,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一总的介绍”,但在此后的“许多年间”,该书因“写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抽象的领域作了深入浅出的阐释”,而“被用作对党员干部进行理论训练的译本基本教材”。这主要得益于布哈林是一名“通俗化的能手”,在写作时保留了其一贯的写作特点,即“设法阐述概括性的结论”。因此,简单化是此书的一大特点,“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更加简单化”。^⑦

布哈林也自称通俗化的写作方式是必要的。唯物史观在苏联被视为社会科学理论的“根本的基础”,在诸多唯物史观译介中,布哈林的《唯物史观》是当时世界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传布最广的著作”,并“在马克思派的哲学著作界中建立相当的权威”。1921 年,布哈林判断苏联“能作一个有系统的说明,到于今还是缺乏”,此类作品仅有柯尔推尔(H. Gorter)的《唯物史观解说》“是唯一的一本

①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10 页。

② 温乐群、黄冬娅《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59 页。

③ 布哈林《社会主义大纲》,高希圣、郭真译,平凡书局 1930 年版,“译者后语”,第 1 页。

④ 《新书介绍:唯物史观与社会学》,《微音》第 2 卷第 3 期,1930 年 3 月。

⑤ 悉尼·海特曼《列宁和斯大林之间:尼古拉·布哈林》,苏绍智等主编《世界评布哈林:译文集》,东方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1、24、13 页。

⑥ 斯大林《论布哈林与右倾》,马克思主义急进社 1932 年版,第 67 页。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编《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译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5 页。该书将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判断为“通俗的社会学”理论书籍。苏绍智等主编《世界评布哈林:译文集》,第 27、31、55、62 页。

书,可是又太简单,对于许多复杂的问题,为我们思想时所必然遇着的一些问题,又完全没有提及”。因此,在苏联“对于唯物史观之一有系统的说明,是十分必要的”。^①故此,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成为此时专门论述唯物史观的专著,八年后被译为中文。布哈林称此前郭泰(H. Corter)的小书“过于庸俗化的毛病,并且对于为我们所必然碰到的许多复杂问题,丝毫没有提及”。由于全书介绍的是布哈林提出的系统的历史唯物论叙述,因此,陶伯的中译本出版后就深受读者欢迎,也达到译者所称的对初学历史唯物论的人的实际效果“有很多帮助(虽然也有害处),尤其是他用很浅显的例子来解释较深的理论时,往往使读者易于理解。”^②

布哈林的写作初衷已有普及的用意,从中文译介来看也确实达到了理论普及的效果。时人认为,此时“在关于唯物史观的著作方面,有系统的说明其理论之基础的,非常之少”,这本“有系统的说明唯物史观的巨著——《唯物史观与社会学》,成为一部目前最需要的书了”。^③平凡书局在推介该书时称“唯物史观是科学社会主义之理论的‘一切基础的基础’,所以研究社会科学的人,第一步要了解唯物史观。本书著者布哈林以渊博的学识,丰富的经验,写成这本唯一的巨著,对于唯物史观,下了个最有系统的说明。”^④可见,书商对该书社会推广价值的认定。

译者为什么要翻译该书?陶伯翻译布哈林该书的理由最具代表性:看中的是该书的系统介绍历史唯物论和通俗化写作两个方面。陶伯认为,这部著作是“相当地实现了他的计划的,他这部书确是自成一格系统,并采用了许多新术语”。在批判该书机械唯物论的基础上,陶伯也认定该书的价值“它在建立历史唯物论的系统方面确有相当的贡献(虽然有很多可置议的地方),特别是对于初学历史唯物论的人有很多帮助(虽然也有害处)。”对于通俗化,陶伯认为该书“用浅显的例子来解释较深的理论时,往往使读者易于理解。这部书现在确已成为世界上传布最广的著作了,尤其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面说来,像如此传布得广的著作恐怕是前所未有的罢。它确然在马克思派的哲学著作界中建立相当的权威。”^⑤该书正如陶伯翻译时判断的,以其系统、浅显的内容在近代中国流行。

三、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扬弃

事实上,当布哈林唯物论凭借译本在近代中国传播之际,无论译者还是当时的理论界都已经对该书有很多评价,肯定与纠错同时存在,显示出对布哈林唯物论的扬弃过程。如在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出版方兴之际,就有学者判断,该书“所发挥的基本观点(关于辩证法、社会、阶级等等)均犯着严重的错误,所以要从布哈林书上,得到正确的唯物史观的了解,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情境下,“切要明了的唯物史观教本,就成为理论上实际上的一个急迫的需要”,译者称要解决此问题,“自然是直接向马克思、恩格斯、伊里奇、蒲列哈诺夫等人的著作中直接去寻找唯物史观学说的

① 布哈林《唯物史观社会学》,“原序”,第1页。

② 布哈林《唯物史观》上册,“著者原序”,第7页。

③ 子真《书评〈唯物史观与社会学〉》,《北新》第4卷第17期,1930年10月。书评者子真也指出布哈林在该书中所犯的重大错误是“太偏重于机械论”。

④ 《布哈林著〈唯物史观大纲〉》广告,参见雷敦等著译《社会经济论丛》,平凡书局1930年版,第484页。

⑤ 布哈林《唯物史观》上册,“译者序”,第7页。

基础”。^①

虽然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因体系性和通俗性一度广泛流行,但随着布哈林在苏联受到批判及这些批判被快速译介到中国,中国也成为批判布哈林理论的一个场域。批判首先来自译者们。1929年,在翻译《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时,校者欧伯虎称,“本书作者布哈林是唯物论中的机械派(Mechanists)的代表之一。书中贯澈了他的机械主义(Mechanism)的观点”,欧伯虎试图撰文详细“指斥”的写作意图,因急于付印,不能如愿,只能待再版时“去实现”。^②1932年,许楚生在布哈林《唯物史观社会学》修订版中称,布哈林“是史的唯物论中之机械论者,书中贯澈了他的这种理论”,并称中译本出版后,国际上有介绍和批评,“而这种介绍与批评年来又流传到了中国”,许楚生本想利用再版的机会,“把这些介绍与批评做一个总括的陈述,又因为时间的仓促,不暇及此,实为遗憾”,但他又判断称“唯物史观的理论博大精深,极完备的一种善本,现在还难于获得,这本书虽不免落于机械的解释,然在社会科学上仍不失为一种极重要的参考书。”^③鉴于许楚生的学科出身,我们可以判断许楚生对布哈林的批判是从社会科学的角

度进行的。

译者陶伯以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对布哈林的批判多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时人曾称陶伯“有一篇很长的序,是用反对派的理论做根据去观察,很值得一读”。^④在序中,陶伯注意到布哈林在书中的理论自诩,但坚持“我们就得于介绍时附以必要的批评,就是应该站在批评的立场上来介绍。因此,我对于布哈林这部书认为有不妥当的或可以讨论的地方是必须指出的。布哈林主要的错误是他偏重于机械论,他公开地说不要将‘机械’与‘有机体’对立起来。换言之,自他看来‘机械’与‘有机体’是没有分别的,因此他企图以自然的机械律来解释人类社会,特别他在第二章中解释‘必然与意志自由’的问题时,他的机械观显得更露骨。他把必然与意志自由看成绝对不两立的东西,好像生物学上的必然律一样,其实这是很错误的”,并指出人类与生物不同。陶伯对布哈林机械论的批判所据多来自该书,显得更有针对性,很多内容是先言布哈林的错误言论,后再以各种经典如《反杜林》《空想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的社会主义》等文献批驳之,认为布哈林疏于或不了解这些经典。陶伯还从理论上批驳该书第六、七章中的部分内容。可以说,陶伯在翻译时注意到该书的机械论,认为“有不少的错误和应提出讨论的,主要的错误就是他的机械论的主张”。对此,他表示自己将来若有机会将把这部书的意见全部发表出来。从陶伯的译者序来看,陶伯掌握的多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中的历史唯物论,具有一定的理论修养。对该书,陶伯“不能不提醒读者留意,我希望读者读了此书以后,能更进一步去读昂格斯、朴列哈诺夫、列宁诸人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如《反杜林》《费尔巴赫与德国古典哲学之末路》《马克思主义的干本问题》《一元史观的发展问题》《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等),尤其希望读者们应将历史唯物论当做一种方法论去研究,不要拘泥于形式和体系。应该学马克思、昂格斯、列宁对此种方法论在实际问题上之如何灵活而正确的运用,应该当做斗争的武器。”^⑤1930年,在中国革命斗争寻找路线之际,在马克思主义学说被国民政府打压之际,陶伯的“希望”无疑是在提醒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

除了译者们的批判外,也有专门的编译著述对布哈林机械唯物论进行整体批判。在 20 世纪

① 吴理屏编译《辩证法唯物论与唯物史观》,“编者序”第1页。

② 布哈林《唯物史观大纲》,伊凡·梅根译,社会经济学社1930年版,“校者序”第1—2页。

③ 布哈林《唯物史观社会学》,“译者序”第1页。

④ 锡《布哈林唯物史观的七种译本》,《读书杂志》第1卷特刊号,1931年4月。

⑤ 布哈林《唯物史观》上册,“译者序”第7—8页。

30年代布哈林著作中译本相对盛行之际,中国学界就开始对这种机械唯物论的批判。布哈林的唯物论在中国首先遭到的是理论的批判。1932年,时潮书店出版曾春编译的《布哈林及其机械唯物论批判》,将之指为机械唯物论进行批判。同年,斯大林《论布哈林与右倾》一书的中文版出版。在书中,斯大林将之称为“布哈林派”“新反对派”,认为“布哈林同志确是个理论家,但还不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而是“左倾反对派的理论家”,还需要学习。^①在国人竞相翻译布哈林此书之际,苏联的哲学界已开始批判布哈林在哲学上的错误。于是,在1931—1933年出现这样一种情状,一边是布哈林著作多译本的流传,一边是中国哲学界对布哈林哲学批判出现高潮。而批判者的理论主要来自苏联、日本的批判文章和著作的译介,加之中国学者批判布哈林的唯物论为机械均衡论。

在布哈林的理论译介时,理论的检选和接受甚至批评是常态。20世纪20年代后期布哈林理论的流行,主要得益于布哈林的国际思想界权威身份。但到1930年,时人已经能够对布哈林的机械唯物论进行批判,认为刘伯英的《历史的唯物论》和梅根、依凡的《历史的唯物论》两个译本的流行使布哈林机械唯物论的错误也得到广泛传播,以至于“减弱辩证唯物论的正确性”。同时,辩证唯物论是富于战斗意义的革命学说,“当它被人当作商品一般运入中国时,更凭空添上一层乌烟瘴气的笼罩……浓雾虽然弥漫穹苍,但它岂能长掩朝阳!”^②

唯物论作为哲学中比较重要的主题,读者也有自己的理解和判断。1931年,时人在阅读布哈林的《史的唯物论》时,提醒读者注意“译本的原著在科学上的估价”,认为“布哈林的《史的唯物论》有着机械唯物论的错误”,因此,要用“正确的眼光去读”。^③当时的读者大致有以下几种态度。第一,有读者虽承认其理论价值,但整体持否定态度。1931年,时人称布哈林的“《史的唯物论》Theor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是中国近年翻译界最周知的一本译本,也是开翻译界的新纪元的一本著作”,在该书广泛传播的同时,人们也注意到该书的错误“是在于唯物史观的方法底运用的形式主义的倾向”,而该书作者“最大的缺点是在于他将辩证法俗化为机械的形式主义的方法”,因此,“我们读完了《史的唯物论》,只能给他一个否定”。^④第二,有读者虽十分警惕布哈林的错误,但未否认其价值。陈端志也介绍了布哈林该书的英文版(*Historical Materialism: A System of Sociology*)称“这是一本研究唯物史观之较好的入门书。虽然关于‘均衡论’一点,布氏是陷于机械论的错误;但就全书来说,还是一本很好的书。”^⑤“批判”布哈林唯物论逐渐由苏联蔓延至中国。中国学界同样注意到布哈林不讲辩证法的事实。1931年,时人称,“近年来新思想的介绍,真是不少,尤其是什么辩证法的谈论,格外普遍。无论是赞成或反对辩证法,总之没有一本介绍新思想的杂志里,找不出辩证法三个字的”,各界谈辩证法,但是事实上对辩证法并不了解。“顶使人烦闷的,就是宣传辩证法,承认辩证法是人们,往往因为书籍的缺乏,多不能正确的介绍这种理论,而且多半是把布哈林的机械唯物论,当做辩证唯物论看待,这使我们不得不感觉到,比较详细的批评布氏的学说,是急切的举动”,最后的评述称“布先生的方法论是不合‘现实’的”,因此,“布先生的方法论到这里也得到逻辑

① 斯大林《论布哈林与右倾》,第67页。

② 吴西岑《机械的唯物论与布哈林》,《动力》第1卷第1期,1930年7月。

③ 《通信:读者来信(四)》,《书报评论》第4期,1931年4月。

④ 文蓬《评〈史的唯物论〉》,《书报评论》第6期,1931年6月。

⑤ 陈端志编《现代社会科学讲话》,第398—399页。

的终极!”^①

广泛的出版推介和普遍的理论批评共存,应该是民国时期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的真实情况。中国学界比较清楚布哈林的机械唯物论,有评者称布哈林“这部唯物史观乃是布氏一生最重要的杰作。自此书出版后,凡世界上有文字的民族差不多都已有翻译,其价值究竟如何,有此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凡欲进一步深究哲学的人,对于此书绝非日置案前不可”。^②时人又称,“这是部世界名著中的名著”,该书“在建立唯物史观的系统方面有很大的贡献”,因此,“这本书现在确已经成为世界上传布最广的著作了”。^③在寻求解决布哈林的理论错误上,时人指出了方向:1930年吴理屏在纠正布哈林的“唯物史观”关于辩证法、社会、阶级等的“严重的错误”时,建议读者“直接向马克思、恩格斯、伊里奇、蒲列哈诺夫等人的著作中直接去寻找唯物史观学说的基础”。^④

余 论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中,我们应该从历史的角度审视其与中国社会历史的逻辑关系,甄别两者的契合度和差异性。从译介布哈林的文本来看,它们正处于中国特色的唯物史观及话语体系构建的一个关键阶段。从根本上来说,唯物史观本身具有的现代性,是其在 20 世纪 30 年代得以在东方社会的中国“开放”的基础。唯物史观是卓越的现代思想,本身蕴含的哲学气质与旨趣也是其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能够战胜各种其他理论的前提,反映出唯物史观传播的东方经验、中国经验。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正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本身从启蒙到革命的因素,因而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之一,同时也在中国场域对托派革命论开展理论批判和严厉批评,甚至在中国场域内国际上各种唯物史观的争论也一并展开。另外,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论证,使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对中国社会的重新认识。这些都在当时唯物史观的译介中得到体现。整个 20 世纪 30 年代,各种派别的唯物史观通过译介传入中国,成为时代最流行的哲学话语。从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理论界、学界的际遇,能够观察到唯物史观中国化的途径:书写的通俗化、理论的扬弃性。

就通俗化而言,原本的通俗化写作是理论普及化的基础。从 20 世纪 30 年代各种中文译介的唯物论书籍来看,最为流行的是通俗化写法为底色的著作,如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米丁等人的通俗小册子或教材等。1921 年布哈林在写作《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时,“始终是为探求马克思主义智识的劳动者们而作”,^⑤因此,布哈林以“社会学通俗手册”作为标题。布哈林是列宁之后在俄国尝试系统阐述党的一般哲学的第一位学者,《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也成为中文译本较多的唯物论书籍,一度十分流行。

近代中国也是唯物史观理论扬弃和逐渐科学化的主要场域。就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近代中国的际遇来看,其影响还是比较持久的,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在理论构建中的

① 陈英伯《评机械唯物论——批评〈唯物史观与社会学〉》,《读者》第 1 卷第 1 期,1931 年 7 月。

② 普赖汉诺夫《近代唯物论史》,王若水译,泰东图书局 1930 年版,书尾有布哈林著、陶伯译《唯物史观》一书的出版广告。

③ 子真《书评〈唯物史观与社会学〉》,《北新》第 4 卷第 17 期,1930 年 10 月。

④ 吴理屏编译《辩证法唯物论与唯物史观》,“编者序”,第 1 页。

⑤ 布哈林《唯物史观》上册,“著作原序”,第 1 页。

扬弃途径。1936年,蔡尚思观察到唯物史观译介在中国的传播情况:“研究马恩有心得的……布哈林最出名之《历史的唯物论》,也有梅根、依凡和刘伯英等译。”随着20世纪30年代译介的发展,“到了近来,研究更进步,理论愈正确,于是‘机械唯物论’的布哈林,已为识者所不取”。^①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前阶段被纳入唯物史观的知识体系中,这些唯物史观译介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产生、发展与演变,乃至最终的成形。1938年,何干之也指出:“在过去几年社会科学的输入时期,文化界差不多完全给布哈林的机械论和德波林的观念论所支配,如许楚生所译布哈林的《唯物史观》和李达所译卢波尔的《社会科学的根本问题》,前者是机械论的经典,后者是德波林的代表作”,面对这种理论的错误,中国学界的检选异常重要,“在清算了左右两种偏向的今日,这些书只有历史的价值,对于初入门的读者,已经不适宜了”。这一时期在中国的“史观教科书”中,“最先出版有华汉的《唯物史观研究》,可惜受当时的水准限制,其中夹杂了许多布哈林、波格达诺夫、德波林、蒲列哈诺夫的旧见解,也不适宜于初学的读者”,而此时需要做的是构建新哲学。^②何干之指出了过去一些有错误的机械论或观念论理论书籍由于译介而在中国广泛传播,这些已经成为“旧见解”,而中国人撰写的各种入门理论书籍中却“夹杂”了许多这种旧见解。对此,何干之指出的方向是“新哲学”途径——“新史观的启蒙”,而由于历史理论的落后,这种启蒙急切需要“补救”。1941年《哲学》杂志整理的“中国新哲学读物出版书目”中列出数十种唯物论著述和译述,其中就包括布哈林的《历史唯物论》《唯物史观》《唯物史观与社会学》《唯物史观大纲》等,布哈林也成为被译介最多的作者之一。^③扬弃立场下布哈林的唯物史观仍然是基本读本,是唯物史观知识源之一。

从布哈林唯物论译介在近代中国的际遇来看,以历史细部来判断理论的生成与从内在判断理论的逻辑生成同样重要。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但事实上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甚至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参考类著述。从译介的历史细部来看,翻译者、出版者无论出于何种译介目的,都起到了宣传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实际效果,体现出民国理论界中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实效性,这是过去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时往往容易忽视的内容。

(作者赵广军,河南大学《史学月刊》编辑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中心研究员;邮编:475001)

(责任编辑:敖凯)

(责任校对:张舰戈)

① 蔡尚思《卅年来的中国思想界》,《蔡尚思全集·蔡尚思集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页。

② 何干之《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基本知识》,平心编《各科基本知识讲话》,第95—96页。

③ 该书目截止1941年4月底,列罗了比较重要的唯物论的译介书籍。参见《中国新哲学读物出版书目》,《哲学》第2卷第1期,1941年5月。

SUMMARY OF ARTICLES

Receptions of Nikolai Bukharin'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China in the 1930s // Zhao Guangjun

The 1930s witnessed a great quantity of foreign works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eing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nd introduced into China, and it was common that one book had several versions of translation. During this perio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 System of Sociology* by Nikolai Bukharin had the most versions of translation. The popularity of this book induced dissemination of Marxist theor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is book, along with other Chinese translations and introductions, became source of reference in the theorization of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1930s. Meanwhile, people of the time had already noticed problems such as mechanism in Bukharin's view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gradually sublated his theory while continuously referring to it as source of reference. In studying the ris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a view on history in modern China, we should not only examine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ory, but also trace its spread and dissemination. Taking the translation, introduction, dissemination and theoretical sublation of Bukharin's theor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1930s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uncovers the complex and dynamic process of reception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Chinese intellectual circles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and deepen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inific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China.

The Orthodox View of History and the Compil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Five Dynasties after the Song Dynasty // Cui Zhuang

China was torn asunder by frequent wars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s period. It becomes a focus of debate among historians on what kind of orthodox ideas to follow in order to compile the history of this period. Five competing views were held by scholars from the Song to the Qing Dynasty. The first is to deem these five continuous dynasties as orthodox, represented by *General History of the Five Dynasties* by Fan Zhi, *Collected Statutes of the Five Dynasties* by Wang Pu, *The Old History of the Five Dynasties* by Xue Juzheng, and *The New History of the Five Dynasties* by Ouyang Xiu. The second disregards the Liang Dynasty as a fake and only admits the other four dynasties into the orthodox tradition. *The Reign Titles of Past Dynasties* by Li Fang, *Abolishing the Reign Titles of the Zhu-Liang* by Song Shiyong, and *Preface to Questioning of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of the Five Dynasties* by Hua Zhan'en cited and discussed this idea. The third takes the five dynasties as "lunar legitimacy" or unorthodox. *Records of the Vestigial Tang* by Wang Gao and the correspondent part of *Outline and Detail of History Retold as a Mirror for Rulers* by Zhu Xi are representative works. The fourth treats the Southern Tang as a continuation of Tang orthodoxy. *Book of the Southern Tang* by Lu You and *Annals and Biographies of the Vestigial Tang* by Chen Ting are representative works. The fifth regards the Later Tang and the continuous Southern Tang as orthodox, represented by *Annals of the Three Tang* by Wu Fei, *Book of the Continued Tang* by Chen Zhan, and *Tang-Song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by Hua Changqing. These five views took different roots in the combined influences from political transition, territorial heritage, family lineage to moral values, all of which are, nevertheless, valid. They are the embodiment of the continuity of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and of ancient scholars' unrelenting pursuit of justice, and they are highly significa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From Deconstruction to Reconstruction: Lü Simian's Study of Mythology // Li Juan

The history of antiquity is an important object for study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research on mythology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Lü Simian followed the logic that society progressed from low to high levels in development and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homogenous human groups" in historical research. The latter was derived from the concept "subordinative thinking". In three aspects, he deconstructed myths from the antiquity and replaced the "old common sense" with new interpretations. Behind the evolution of